

# 抗战期间国定本发行体制的出台与困境

曾凡菊, 贺金林<sup>①</sup>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图书馆,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 抗战期间, 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加强推行党化教育的力度与解决后方中小学教科书供应的困难局面, 于 1943 年推行了国定本发行体制。然而这一新体制的出台却并未达到当局预期的目标, 其中原因则是其统治区域的缩小、其他书局的抵制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所致。

**关键词:** 抗战期间; 国定本教科书; 发行体制; 困境

1943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推出的国定本教科书, 是近代以来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这一新体制的出台, 一方面固然是国民政府为了解决后方中小学教科书供应短缺的严重局面, 另一方面则是力图通过教科书的发行来更好推行党化教育的需要。然而受国民政府统治区域缩小、各利益集体之间的矛盾与利益冲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国定本教科书的发行却并未达到教育部先前预想效果, 从推行之日便陷入困境。长期以来, 学界对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推行的国定本发行体制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本文力图就管见所及, 对此作一简要的探讨, 以求教于方家。

## 一 国定本发行体制出台的背景

伴随着清末新政以来新式教育体系的逐步确立, 中小学教科书出版发行这个新兴行业也逐渐开始兴盛起来。各书局根据教育行政部门颁布的课程标准自行编订教科书, 报请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审定后即可自由印行, 由各学校自行决定采用何种版本的教科书, 这就是所谓的“审定制”, 教科书则称之为“审定本”。审定制虽然有着容易受到书商们垄断的弊端, 但其最大的优点是, 由于各书局之间存在竞争关系, 因此竞相改善教科书的质量与降低教科书的价格, 从而使得中小學生能够得到良善的教科书。审定制历经多年, 催生了教科书出版业的逐渐壮大。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 便是在清末民初的中小学教科书出版与发行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图

书发行体制, 均是采用各书局自办发行或小书店代销的形式, 因此各书局均拥有自己较为完善的出版与发行系统)。

与清末民初历届中央政府不同的是,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 一改过去历届政府放任的教育政策, 开始逐步加强了在中小学校实施党化教育的力度, 而教科书的审定便成为实施党化教育最为便捷的手段。在 1929 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正式通过了关于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的新决议。新决议中明确地把三民主义作为教育宗旨确定下来, 规定“中华民国之教育, 根据三民主义, 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持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 务期民族独立, 民权普遍, 民生发展, 以促进世界大同”。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 教育部在不断加强对教科书的审查力度的同时, 也开始着手国定本教科书的编撰工作。这一工作是在 1933 年朱家骅继任教育部长之后开始的, 此年教育部组织成立了中小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 特约一批专家执笔, 开始从事编撰中小学教科书工作。教科书编成之后, 由于教育部缺乏印刷发行机构, 各书局自然不可能舍弃自己编辑的教科书来发行国定本教科书, 此次编撰的国定本教科书在抗战以前未能印行。<sup>[1]355</sup>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为教育部进一步控制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发行提供了一次绝好的机会。1938 年, 在武昌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 中小学教科书问题成为各位代表讨论的

<sup>①</sup> 收稿日期: 2007-09-28

作者简介: 曾凡菊, 女(土家族), 湖南石门人,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图书史与图书馆史。

焦点。各位代表纷纷认为,为了使中小学教育更好的配合抗战需要,必须进一步加强在中小学实施爱国爱乡教育,并以更有力的手段实施党化教育。会议最后通过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中明确提出,“对于各级学校各科教材须彻底加以整顿,使之成为一贯之体系而应抗战与建国之需要,尤宜先尽编辑中小学公民、国文、史地等教科书及各地乡土教材,以坚定爱国爱乡之观念。”<sup>[2]14</sup>

根据会议指示精神,教育部订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成立各级学校各科教材编订委员会,先草订或修正各级学校各科课程标准,再依照课程标准订定各科教材要目,以为选择教材及编辑教科书之标准”;同时规定“中小学及师范学校所用之公民、国文、历史、地理教科书,应由国家编辑,颁发应用。”<sup>[2]28</sup>新的编辑方针确立以后,教育部在后方重新编订了新的教科书课程标准。根据以往的惯例,各书局随之将修订后的教科书送往国立编译馆审定。与战前不同的是,此次课程标准虽已颁布多时,但各书局并未像从前那样开始着手修订教科书内容,而是继续发行战前的审定本与抛售存货。这样不仅新的课程标准无法推行下去,更严重的问题是,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恶化,就连战前的审定本也无法保证充分供应。抗战军兴之后,由于多数书局未能及时将印刷设备抢运到后方,后方教科书发行一时跟不上,从而造成了后方许多地方出现“书荒”的现象,一些学校不得不采用油印本或手抄本来勉强维持。在太平洋战事爆发以前,后方学校教科书的供应还可依靠从东南沿海一带输送。由于运费高涨、运输困难、货物损伤等原因,运至后方的教科书价格已经翻了四五倍之多。但自1942年东南沿海一带被日寇侵占以后,“书价虽然如此高涨,假设尚能源源而来则问题或者不至十分严重,可是现在的情形,即使愿出高价,书店仍然无法供应。”<sup>[3]</sup>

## 二 国定本发行体制出台的实施举措

1938—1942年间,受大后方物质条件所限,国统区中小学教科书版本芜杂,印制不良,社会各界人士要求改善教科书供应的呼声很高。蒋介石对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工作甚为重视,为此他曾多次致函教育部长陈立夫加强改善工作。在1942年5月给陈氏的信函中,蒋氏建议“以后凡中小学教科书应一律限期由部自编,并禁止各书局自由编订。”<sup>[2]458</sup>1943年,冯玉祥在给陈立夫的

信函中也曾指出,后方教科书“纸张印刷多不清晰,且易磨损,儿童目力实多伤害”,要求教育部飭令印刷书店多加改善。<sup>[4]</sup>

如何既能改变当前教科书供应短缺的局面,又能将战时教育方针贯彻下去,教育部想到了战前曾经尝试推行部编教科书的做法。在蒋介石的建议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推动下,自1942年年底开始,教育部将部编初小国语常识课本暂行本8册及教学指印交给正中书局出版供应,解决了一部份的困难。但随着陆续编定的稿本越来越多,正中书局不能独任供应之责。1943年4月,教育部将部编教科书,以及由正中等书局自愿交出,并经国立编译馆审定通过教科书的发行权,交由“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简称“七联处”)统筹供应,这个机构是由在后方设立了总管理处的正中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文通书局等七家书局联合组织的。教育部限令自1943年秋起各级学校开始采用国定本统一教本,以保证教科书质量。根据教育部与七联处达成的协议,所有小学各科、及中学公民、国文、历史、地理各科教科书,均由七联处负责供应,其余各科教科书由各校自行选用审定本。七家书局因资金有厚薄,分局有多少,可能负责供应的区域、数量也各有不同。在教育部的协调之下,最终核定七家书局分配成销的比例分别是:正中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各占23%,世界书局占12%,大东书局占8%,开明书店占7%,文通书局占4%。<sup>[5]</sup>为了使国定本教科书得以顺利推行,同年11月,教育部重申:“所有各书局编印同类教科书之版本,不论其尚在审定有效期间,或已通过审定有效期限,或曾经核准发行,或尚未经审定者,均一律停止发行。”<sup>[6]</sup>值此,中小学教科书的供应体制完成了由审定制到国定制与审定制并行供应体制的转变。

要做到国定本教科书的普遍供应,七联处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各家书局尚存的审定本问题。1943年11月,七联处向教育部提出的解决方案为:“中小学教科书各科已有国定本供应者,各书局应将存在各地印刷机构同类教科书之纸型,汇交七联处,由部方派员监视封存或销毁”;在交通不便的区域,可以全部推销各书局编印经审定或核准发行的存书,“但以33年春季一学期为限。”<sup>[7]</sup>

为切实推行以上举措,1943年11月22日,七联处举行了1944年春季国定本教科书发行谈话

会。各书局代表首先报告了所存中小学教科书的情形, 各家书局约有存书 1000 万册, 大部分为初小国语、常识两种。谈话会最终商定处置存书办法如下: 1. 各书局按照报告数量, 将存书一律交七联处统筹分配销售。2. 中小学各科教科书已有国定本供应者, 各书局因应将存在各地印刷机构同类教科书之纸型, 汇交七联处, 由部方派员监视封存或销毁。3. 1944 春季, 七联处应将国定教科书先行分配于印刷地点附近交通便利之县市, 以销售 900 万册为度 (旧存 100 万册及新印 800 万册)。其他地点区域范围由七联处迅速拟定后, 呈报教育部审核, 经教育部核定后, 通令各省市在指定县市内应绝对改用国定本, 不准沿用各书局编行之版本。4. 在交通不便之区域, 可全部推销各书局编印经审定或核准发行之存书, 但以 1944 年春季一学期为限。5. 各书局依照现课程标准新编之各科教科书尚未经审定或核准发行者, 国立编译馆应就已送审之版本, 迅即审核, 如内容尚无不合, 其已印存之书, 亦得照上项规定办法处置。<sup>[8]</sup>

### 三 国定本发行体制面临的困境

七联处成立以后, 国定本教科书的发行并不乐观。到抗战胜利前夕, 国定本教科书的发行范围与规模仍然甚小。这其中除了国立编译馆编辑进度缓慢、七联处资金有限与国统区运输条件限制等原因外, 一些中小书局对之采取抵制态度, 也是其发行不畅的重要原因。

首先, 各中小书局所剩存书甚多, 以及国立编译馆教科书及其配套指引未能及时编辑完成, 大大影响了国定本的发行。在七联处成立之后的 1943 年秋季, 国定本教科书的发行情况就不理想。据七联处主席吴秉常 11 月 2 日在座谈会报告中显示: “七联处 1250 万元的流动资金, 已全数用于印制国立编译馆已交到之各科各册课本。只是因为技术人员缺乏, 纸张供应困难等种种问题, 业务未能顺利进展。各地学校亦有以高小初中各科仅有一册, 尚未全部出版, 小学各科教学指引亦未完全, 尤以初小国语、常识两科须配合教学, 若无指引, 更难教授, 是以多不愿采用。各地小同行及贩卖合作社颇多积存各书局编印之教科书, 闻悉中央将推行国定统一课本, 急需将存书脱售, 因是有运动各学校提前开学者。由于以上各原因, 本学期国定教科书之推行未能顺利。”既然国定本尚未编辑成套, 各家书局也就不愿舍弃已经轻车熟路的审定本, 中小学教员也不愿使用新近出版

的国定本, 而更愿意使用旧有的审定本。为解决此等难题, 七联处敦促国立编译馆尽快完成尚未编成的各册教科书, 最迟应于 1943 年 11 月 10 日前交出, 以便能够在 1944 年春季做到在国统区普遍供应。<sup>[8]</sup>

其次, 七联处 7 家书局资金缺乏与内部矛盾, 发行大受影响。受战局与资金的影响, 七联处成立后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各地教科书供应紧张的问题。它无雄厚的资金, 每到教科书发行之时, 便不得不从四联总处商洽贷款, 但每次所贷款项总被大打折扣。如 1944 年春季七联处计划供应国统区国定本教科书 800 万册, 资金至少须五六千万元; 七联处除上期及本期收到七家缴到之资金共 2500 万元外, 尚有 2500 万元的缺口无法解决, 只好求救于银行贷款。<sup>[8]</sup>随着国立编译馆编订完成交给七联处发行的国定本教科书数量越来越多, 七联处的资金缺口也越来越大。如在 1945 年 4 月, 七联处原拟为此年秋季教科书发行贷款 12 亿元, 但教育部首先将之核减为 4 亿元, 到四联总处实际贷得金额只有 3 亿元。<sup>[9-10]</sup>即便是取得银行贷款之后, 各家书局唯恐发行不畅而导致存书过多, 往往不能按照先前的协议完成所规定的供应比例。

再次, 受运输条件影响, 七联处的国定本发行区域大为缩小。七联处各家书局无法供应战区教科书, 教育部只好允许战区各省市就地翻印。从七联处与教育部的来往文书中可以看出, 在七联处发行体制推行一年之后的 1944 年, 七联处的供应范围仅限于全国 13 省 251 县市, 未能依照合约满足全国各省市的需要。<sup>[11]</sup>为使国定本教科书在这些地区能够得到推行, 教育部只好特许湖南、浙江等省教育厅有就地翻印的权利。<sup>[12-13]</sup>

最后, 国定本教科书发行体制的出台, 打破了长期以来各中小书局均能发行审定本教科书的惯例, 造成了七联处与各中小书局之间严重的利益冲突。自七联处发行体制出台以后, 中小学教科书的发行权逐步转移到七联处的 7 家书局之手。长期以发行中小学教科书为业的中小书局必然会对之采取抵制措施。虽然教育部明令各地禁绝战前的审定本, 在一些七联处各家书局销售网络无法到达的地带, 中小书局发行的审定本仍有广阔的市场。特别是由于在敌我争夺激烈的战区, 七联处没有完善的销售网络, 因此根本无法与一些中小书局相抗衡。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 自国民政府上台以后, 为

加强推行党化教育的力度,曾试图发行国定本教科书,但由于各书局的反对与教育部缺乏发行机构而未能如愿。抗战期间,为解决后方各省教科书供应困难的局面,以及将战时教育方针贯彻下去从而加强党化教育的力度,1943年教育部出台了国定本教科书发行体制。这一新的教科书发行体制的出台,终于为国民政府推行党化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然而受国民政府统治区域缩小、各家书局资金困难与各出版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冲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定本教科书供应状况却并不令人满意,各种版本的教科书与翻版的国定本教科书充斥其间。这一新的教科书发行体制自出台之日起便陷入了困境。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8 355.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G].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3] 陈剑恒. 书价高涨与严重的书荒[J]. 教育通讯, 1940 3(7): 3- 4

[4] 沈 岚. 冯玉祥关于改善小学教科书现状与陈立夫往来函[J]. 民国档案, 2002(3).

[5] 魏冰心. 国定教科书之供应问题[J]. 教育通讯(复刊), 1946 1(13): 14- 15

[6] 教育部训令(1943- 11- 08)[J]. 教育部公报, 1943 15(11).

[7] 国定中小学教科书编辑印制供应问题谈话会: 1943- 11- 02[B].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5- 1305- 25- 28).

[8] 国定中小学教科书编辑印制供应及存书问题谈话会: 1943- 11- 22[B].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5- 1305- 29- 30).

[9] 教育部公函: 1945- 04- 28[B].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5- 1299- 33- 34).

[10] 教育部代电: 1945- 06- 01[B].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5- 1301- 14).

[11] 教育部司函: 1944- 02- 17[B].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5- 1300- 10).

[12] 教育部指令: 1943- 09- 17[B].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5- 1299- 36).

[13] 教育部电: 1944- 01- 15[B].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5- 1300- 5).

(责任编辑: 骆晓会)

(上接第46页)

[10] 路义忠. 华北教会与义和团运动[C]//中国义和团研究会.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济南: 齐鲁书社, 1992 365

[11] [美]马 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M]. 张汇文,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58 258- 259.

[12] 陈振江,程 黻. 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

[13] 廉立之,王守中. 山东教案史料[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0 244

[14] 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义和团(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146

[15] 罗志田. 社会分野与思想竞争: 传教士与义和团的奥妙互动关系[J]. 清史研究, 2002(1): 48- 61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义和团史料(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230- 233

[17] 胡寄尘. 清季野史[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56

[18] 史革新.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思想启蒙[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5): 13- 21

[19] 佚名. 中国灭亡论[C]//张 枬,王忍之.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第1卷上册. 北京: 三联书店,

1960 78- 89.

[20] 佚名. 莫错过[N]. 大公报, 1902- 10- 04

[21] 麦孟华. 论义民与乱民之异[N]. 清议报(第52册), 1900- 07- 26

[22] 佚名. 主权篇[N]. 中国旬报(第33期), 1900- 12- 26

[23] 佚名. 刊词[J]. 蜀报, 1903(1).

[24] 邓秋牧书[N]. 觉民, 1903- 09- 10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义和团史料(下)[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2 666- 667

[26] 程 洪. 直鲁豫社会的结构变动与义和团运动[C]//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 成都: 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26- 61

[27] 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M]. 香港: 三育图书有限公司, 1980

[28] 赵 振. 说败[C]//张 枬,王忍之. 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 第1卷上册. 北京: 三联书店, 1960 20- 21

[29] 梁启超. 中国积弱溯源论[M]//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五. 北京: 三联书店, 1960 22

(责任编辑: 骆晓会)